

高教视野

〔2017〕第2期

贵州大学学校办公室编

2017年4月24日

本期要目

【高教要闻】

- 1 教育部：进一步严格高校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
- 2 高校简政放权若干意见发布，职称评审权下放高校，改变评价方式！

【高教观点】

- 3 大学最重要的改革是教育教学改革
- 4 现代大学制度怎么建才“管用”

【人才培养】

- 5 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

【队伍建设】

- 6 从人才评价定位看当前职称制度改革

【信息摘编】

- 7 “一带一路”教育在行动

【聚焦“双一流”】

- 8 “双一流”大潮中的乱象与抉择
- 9 “双一流”建设与东北、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

【高教要闻】

教育部：进一步严格高校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

1 教育部：进一步严格高校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

近日，教育部下发文件，进一步严格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严厉打击自主招生中的专利、论文买卖和造假等行为。文件提出“五严格”工作要求，分别是严格报名条件、严格材料审查、严格学校考核、严格监督制约、严格惩处造假。（教育部网站，2017年4月13日）

2 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管理办法出台

近日，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管理办法》《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管理办法》，对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实施工作作出进一步规范，完善统分结合、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提升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2017年4月17日）

3 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创新创业学院”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据了解，国科大创新创业学院是国科大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号召，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国科大“科教融合”办学方针成立。（中国新闻网，2017年4月18日）

高校简政放权若干意见发布，职称评审权下放高校，改变评价方式！

4月6日，教育部官网发布了《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干货给大家分解如下（从内容来看，是对前期多项文件的汇总整合）。

一、学科专业设置

1. 省级学位委审批学士学位授予单位、专业，初审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和博士学位授权。

2. 高校自主设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的专业，报教育部备案；鼓励高校设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业。

二、编制及岗位

1. 试点高校人员总量实行总量核定、动态调整。

2. 高校自主设置内设机构、自主管理岗位。改革后要保障高校内设机构人员享有相应的晋升、交流、任职、薪酬及相关待遇。

三、进人用人

1. 自主制订招聘或解聘的条件和标准，自主公开招聘人才。

2. 对总量内人员，高校与其签订聘用合同。在人员总量外，高校可自主灵活用工。

四、职称评审

1.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

2. 针对不同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

五、薪酬分配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核定高校绩效工资总量。

2. 在总量内可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办法。

3. 绩效工资分配要向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工作人员倾斜。

4. 高校自主处置已达使用年限、应淘汰报废的资产，处置收益留归学校使用。

5. 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

（每日高教要情，2017年4月6日）

【高教观点】

大学最重要的改革是教育教学改革

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拉开帷幕。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全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下午一点半，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校长是永骏、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李剑阁、韩国首尔传媒大学校长朴承哲出席了本场论坛，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兼新闻主播吴小莉主持论坛。在会上，邱勇对于教育改革、亚洲大学联盟、新技术及体育对教育的影响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是邱勇校长的部分观点实录：

关于亚洲大学联盟：为什么清华大学要牵头成立亚洲大学联盟？成立亚洲大学联盟的目的是什么？即将发布的亚洲高等教育年度报告有何亮点？

邱勇：未来的大学会有很多特征，我个人认为未来大学最大的特征应该是开放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在讲教育的国际化，尤其是大学的国际化。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清华大学在2016年，第一次制订、发布、并且正在实施清华大学的全球战略。

去年，我们跟亚洲的若干所大学探讨，面对大学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亚洲的大学该做什么事情？通过去年的准备，我非常高兴地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平台上宣布，今年4月29日，我们将在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亚洲大学联盟。

这个联盟的创始成员将包括15所亚洲最好的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等，这些大学聚在一起有这样一个初衷，促进亚洲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杰出人才。我们希望亚洲大学共同探讨亚洲的价值，亚洲大学的办学理念，提升亚洲大学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权。我希望、也相信这样的举动一定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一定会促进亚洲大学、促进亚洲高等教育的发展。

提高亚洲大学的话语权，怎么提高，我们要研究、交流，当然也要发出声音，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亚洲高等教育年度报告。在第一期的报告里，我们会反映出亚洲大学对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观点。同时，我们想突出高等教育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西方的教育、美国的教育都有成功的一面，但是我们认为东方的教

育思想也有很多值得大家传播、传承和珍惜的。

关于教育改革：大学教育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在哪里？

邱勇：改革必然有重点，在我看来，大学的改革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还是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教学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教育过程之中的改革，改革什么呢？要真正把学生放在教育的中心，增加学生的自主权，使他们有选择的余地，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第二个环节，我们培养什么，知识肯定不应该放在第一位，能力也不应该放在第一位。清华大学提出教育教学改革，培养的模式是“三位一体”，有知识、有能力，但是放在第一位的是价值塑造。价值塑造还是最重要的，它从根本上影响学生的成长。能力重要、知识重要，但是最终能不能承担社会责任，能不能做出大的贡献，还是在价值引导上。

给同学们的寄语

我们都知道读书对年轻人成长的重要性，读书会让人安静下来，会让年轻人感悟生活和人生。从2015年开始，每年考上清华的本科生在拿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会收到校长送的一本书。2015年我送给清华大学学生的书是《平凡的世界》，2016年是《瓦尔登湖》。

我分享给大家《平凡的世界》里面的一段话。

“当然，他们如此拼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

现代大学制度怎么建才“管用”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许多难题。比如，大学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大学缺少办学自主权，在很多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法

制不健全；在一些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学术风气不够纯正，办学质量不高，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等等。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而且，我们还必须老实承认：在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现代高等教育，实在还没有太多成熟的经验。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中国建设现代大学的时间才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间也几经曲折，真正静下心来埋头办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需要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急不得。

同时，上述问题或许也并非中国大学所独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全世界的大学，都正在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在发达国家，有些大学与市场走得太近，市场的逻辑影响了学术的独立，大学沦为经济力量的附庸，这也是值得警惕的。

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什么？怎么样让大学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创新人才、孕育时代精神、引领社会风气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官僚机构或者公司？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是，建立和健全“现代大学制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词，但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我认为，简而言之，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能够明确界定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科学合理地设计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保证大学实现良好治理的制度体系。

为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我们一方面需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经验，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中国大学制度的本土资源。这些本土资源，才是我们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我们要认识到，这些资源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尽管有些东西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带着“土”或者“苏联模式”的印记，但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合理性，甚至有着丰富的智慧。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本土资源，渐进地、稳妥地推进改革，从而真正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而非简单地从西方移植。

我们都有哪些本土资源呢？我想举一些例子，比如：

第一，中国的大学承担着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直到目前，中国的大学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性质，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不仅要管理

教学事务，为老师的科研提供服务，还常常要负责教师的住房、医疗和养老，甚至我们还可能需要安排教师家属的工作，为教师子女提供优质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等等。这些在西方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

这种单位制度，看起来是比较落后的，因为大学提供了过多的福利，没有引入市场模式，效率并不高。但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这些制度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拥有的财富还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尽管最近十年，一部分大学获得了国家的特别财政支持，在某些领域“不差钱”了，但与西方的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所拥有的资源还很少，大学的薪酬水平还很低，我们还很差钱。要确保师资队伍的稳定，留住和吸引宝贵的人才，我们就必须继续提供全面的福利。

现在，中国的大学都在努力引进高端的学术领军人才，而这个方面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的大学暂时还很难提供西方大学那样高的报酬，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其它方面的福利。

第二，毋庸讳言，中国的大学经常被一些负面新闻所困扰，个别大学教师的道德水准下降。尽管如此，我认为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大学在思想道德领域有着比较有效的管理制度，大学强调崇高的理想与信念教育，要求大学的师生在精神道德方面成为模范，要求大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严于律己、乐于助人。

我们办大学有两个口号，一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另一个是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大学特别重视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重视教育公平，我们千方百计地为贫困的学生提供资助，为遇到困难的师生解决问题，在北大，甚至还专门办有平民学校，为学校的服务人员，比如保安、清洁工、厨师等提供免费的培训。尽管现在中国的大学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但有关的理念、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不能否定这些制度，而是应该继续改进和加强这些制度。

第三，中国大学努力服务国家与地方的发展战略。比如，国家要求北大对西部地区的新疆石河子大学和西藏大学进行对口支援，我们将最优秀的教师和干部派到那里进行服务，帮助他们建设先进的实验室，帮助他们培养博士等等，这一切都是北大无偿提供支援，对于志愿到边疆地区的学者，我们还要进行奖励。在西方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很伟大的志愿者，但是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制度，作为国立大学的一项基本职能，恐怕是没有的。通过这样的制度，大学为促进社会的公平做出了贡献，大学的师生也通过志愿服务得到了道德的升华。中国社会对公

平特别敏感，公平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基石，所以大学必须成为促进公平的一个机制，而不能固化阶级、助长不公。

此外，中国大学内部的一些管理决策制度也是有优点的。我们与西方大学存在着许多不同，比如我们的校长往往并非职业教育家，未必是教育家办学，这可能导致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但我们也有一些长处，比如，我们特别强调大学内部决策的民主化，对任何重大的事宜，都必须在学校的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上进行集体决策；又比如，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强调依法治校，在北大，任何一项规章制度的出台，都必须符合一套严格的程序，我们特别强调程序正义。北大制订了自己的“立法法”——《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我们推出新的制度，必须进行多次论证，征求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然后由学校的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审核，最后才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应该说，从程序上是非常严格的，能够尽可能地吸收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中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制订和实施大学章程，当然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要尊重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我们又不应该对西方大学制度抱有迷信，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制度，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靠引进和移植了一套西方的大学制度，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大学的所有问题。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一个渐进的、改良的过程，制度的形成需要长期的付出，需要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契合，要在中国大学自己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要与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以及剧烈变迁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这样的制度才会真“管用”，讲自己的话，讲实在的话，能解决中国大学实际面临的真问题。（吴志攀，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3月31日）

【人才培养】

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在中国渐成气候。无论赞成与否，它都成为本科教育改革无法回避更无法忽视的一个存在。

然而，一拥而上的改革似乎带来的只是浮躁，形式上对英美通识教育的模仿在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的同时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

人们开始怀疑：通识教育有效的吗？通识教育究竟提升还是降低了本科教育质量？通识教育是中国本科教育改革的方向吗？

对于这些问题，简单答“是”或“否”都是不严肃的。我们必须追本溯源，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通识教育，厘清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才能明确如何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1 通识教育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委员会发表了划时代的经典文献《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在呈送给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的报告函中，委员会明确提出：“美国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它是要将自由的和人文的传统灌输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之中。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大量的未来公民理解自己的责任和利益，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是自由的人。”

我认为，这段话是理解西方或美国通识教育的“总纲”。也就是说，通识教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深刻根植于美国社会实际的教育。

理解通识教育的真义，我们必须回到美国通识教育产生时的社会背景和实际情况去理解。

通识教育绝不是一群教育学家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美好概念，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世界都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哈佛那些伟大的学者已经预见到了美国和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分化、分裂、动荡和冲突等种种危机，二战期间具有相同专业知识的科学家在不同价值观下往往会做出截然相反的行动，就是这种危机的佐证。

为了克服这些危机，他们选择了通识教育之路。通识教育的核心目标，是让学生树立起对美国社会的信念，认同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推动美国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英美社会普遍推行通识教育，绝不仅仅只是因为通识教育本身具有价值，也不仅因为它是英美教育传统中的精髓，更是为了解决英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教育领域所做出的扎扎实实的努力。这种努力虽然极为艰难，也充满了曲折，但却不能不承认其效果显著：它的确帮助美国成功度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期，并起到了支撑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作用。

2 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从通识教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为美国利益服务固然是通识教育的终极目标，但它的确有效提升了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并在事实上提高了受教育者的能力。

看清楚通识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不意味着通识教育思想不能为我所用，恰恰相反，如果通识教育能够有效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实现创造性转化，也一定可以改善和提高中国的教育质量。

特别是，虽然通识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根植于西方文化，但其具体措施却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

通识教育在英美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目标包括凝聚社会共识、辨别判断价值观、表达与交流、终身学习、丰富人生、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等多个方面，从当前实际出发，我主要谈前两个方面。

首先，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凝聚社会共识。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人们往往关注通识教育的实现模式和具体措施，却忘记了通识教育的目标。社会需要共识，今天处在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凝聚自己的社会共识。

凝聚社会共识不能只依靠动员、宣传、口号和标语，也不能只依靠开会和文件，最根本的手段是教育。通过教育，学生逐步懂得世界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社会是什么，自己是谁；通过教育，学生逐步领悟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个人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前进方向；通过教育，学生逐步学会和他人的沟通、交流、妥协与合作，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正确理解他人观点；等等。

因此，就可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凝聚起社会对中华文明、改革开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这一功能只能通过通识教育实现，任何其他机构和专业教育都无法替代。

其次，通识教育具有辨别并判断价值观的功能。凝聚社会共识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现起来非常艰难。不是说有了一个目标，人们就会自动去实现这个目标。

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人们对于目标的认识和认同，而这种认识和认同又源于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内心的想法和判断。

在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的选择是什么？学生对此必须能够鉴别并做出判断。要想能够鉴别并做出判断，首先必须了解这些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它们产生的基础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专业教育要么无法提供，要么很难提供，只能依靠通识教育。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鉴别价值观并做出判断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但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有些价值观的正确与否一目了然，比如，不能杀人、偷盗和强奸等，但有些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就不一定那么泾渭分明。

实际上，价值观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之中，正确与否也总是反映这个社会中的人群的主流认知与理解。

目前，一些中国大学仿照英美大学的核心课程体系，也开设了诸如“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之类的课程。

然而，讲述并让学生了解什么是西方文明并非是我们的目的——虽然它也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比较，帮助学生更深刻地思考、理解、体悟中华文明的价值，明白中国道路选择的意义，从而树立起中国文化的自信。这才是通识教育帮助学生辨别各种价值观并形成判断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非此就不可能收到教育的效果。

3 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通识教育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深刻根植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要实行通识教育，不是因为通识教育是个好东西，而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

重建中国的通识教育，我们需要从古代中国的教育智慧中汲取力量。如果说通识教育的理念源于古希腊的话，它的另一盏明灯就点亮在春秋时期的中国。

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其实早就蕴含着通识教育的思想，并且远比西方超越。这个思想不仅是指“通识”，而且是指“通德”。这个“德”就是价值观，也即道德。

我的意思是说，重建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我们至少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不同文化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思想源泉。正如西方通识教育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只有也正是这个传统而不是西方传统才更契合今天的中国社会。第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立场。正如西方通识教育的立场是西方人和西方一样，中国通识教育的立场只能也必须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立场。第三，不同社会的通识教育要解决各自所面临的不同社会问题。正如西方通识教育要解决西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相对立，而是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有所区别，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通识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凝聚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以往这项工作是由思想政治课和党团活动来完成的。这是必要的，但仅此还远远不够。

我认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缺陷：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之间的割裂。教育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把思想政治单列出来，表面上看是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其结果很可能是降低了实际的教育效果。

二是教学模式陈旧，方法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学习思考的兴趣。实际上，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学生所接触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同小异，内容、形式和方法枯燥重复，缺乏新奇的刺激，难免产生倦怠。

三是没有用教育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告诉了学生很多现成的结论，教师精心编写了教材，但却很少要求学生去阅读经典原著，也没有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讨论交流机会。现在有多少学生通读过《资本论》？有多少学生通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有多少学生在课堂上围绕着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过讨论？不读书，不思考，不讨论，这哪里是教育？

其次，通识教育要帮助学生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本科阶段，学生应当对当代世界的几种主要文明和价值观有所了解和认知。

但这种了解不应当是浅尝辄止，而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了解各种文明

的精髓。比如，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文明的主要观点；等等。课程不能纠缠于具体的知识，因为每一种文明都博大精深，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像专业教育那样去学习，必须使他们在有限的的时间里掌握最基本和最精髓的内容。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够对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比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

上述两点是建设中国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但做到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成了通识教育的任务。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课的“旧酒”装入通识教育的“新瓶”之中，那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通识教育，我们还必须做到：帮助学生切实提高交流的能力，帮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使学生的人生变得更有趣味，更为丰富，帮助学生克服专业教育带来的狭隘。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识教育仅仅是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见到一定的成效，至今仍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之中。

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也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我们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东西方的教育传统中汲取精华，踏踏实实地探索自己的通识教育模式，明确目标，改进教学理念和方法，同时具有足够的耐心，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才能提供给学生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实现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价值。（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光明微教育，2017年4月11日。）

【队伍建设】

从人才评价定位看当前职称制度改革

在现有体制内单位中，以面向所有专业技术人才设立的职称评价标准，作为用人单位人才评价的标准，导致一些单位出现“想用的人评不上，评上的人用不上”的尴尬。

2017年年初，随着《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关系到5500万名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制度，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前职称制度的突出矛盾

普适性与针对性间存在矛盾。在现有体制内单位中，以面向所有专业技术人才设立的职称评价标准，作为用人单位人才评价的标准，导致一些单位出现“想用的人评不上，评上的人用不上”的尴尬。组织对人才评价的针对性需求与职称评价的普适性供给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当前建立科学分类评价制度、改变评价标准“一刀切”等措施，亦旨在解决该供求矛盾问题。在实践中，围绕上述问题，一些体制内单位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展开探索，“评聘合一”与“评聘分开”成为当前两种主要做法。然而，“评聘合一”仍未打破“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聘用困局；“评聘分开”解决了职称晋升难的问题，但又引发评上的人聘不了，待遇上不去，激化了组织内部的矛盾。

静态性与动态性间存在矛盾。为规范事业单位管理，专业技术职称总量和结构比例由政府核定，且常是相对固定的。而单位内部人员的流量和存量在不断变化，人才结构比例也在调整，导致职称职数供给与需求常常失衡。例如，有的单位因多年停招新员工，随着现有员工的退休或流出，出现高级职称职数空缺，晋升高职称相对容易。而有的单位由于短期内新进员工较多，同时员工流出较少，导致高级职称职数紧张，职称晋升难度相对较高。职称职数供求失衡导致不同单位间人才评价结果差异大，职称评价结果不具有普适性。

终身制与聘任制间存在矛盾。自1986年以来，我国的职称制度改革进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阶段，即作为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聘任制，有一定的任期而非终身制。然而实践中，我国的职称仍具有浓重的“身份”色彩，聘任制演变为无限期连聘，成为一辈子的光环，不仅要兑现在职待遇，退休后还可以享受相应职称等级的待遇。

未来推动职称制度进一步健全的思考

根据《意见》，从评价定位看，职称改革呈现出两个趋向：

对于体制内单位而言，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将促进职称评价从组织外部人才评价开始向组织内部人才评价转变；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而言，职称制度体系和职称标准的改革完善，将促进职称评价与组织内部人才评价衔接，以发挥职称作为人才社会评价的作用。

支持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内部人才评价体系。相比于政府、第三方社会组织，用人主体在人才评价方面更有发言权。因此下放职称评审权将促进事业单位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职称评价制度，从而更有利于人才价值的发挥和实现。当前浙江省已经全部下放省内高校的职称评审权，从以前的政府定标准、政府评价、政府发证、用人单位聘任，向用人单位定标准、用人单位评价、用人单位发证、用人单位聘任转变，评聘主体脱节的问题得以解决，有效激发了高校的活力。但在职称总量、结构比例，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仍受较大束缚，需要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

推动“评、聘、用”三者间关系的统一。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厘清“评、聘、用”三者的关系是职称改革的关键。实践方面，浙江省高校的职称改革在下放评审权后，通过“淡化资格”改变职称终身制的观念，重点在聘用上下功夫，将“聘”“用”结合起来，让教师能上能下，大大激发了高校人才的活力。中科院的改革探索则是淡化职称概念，强化按需设岗、以岗定薪，即一名助理研究员也可以担任项目负责人，获得高于研究员的薪酬待遇，有效促进了青年人才的成长。中国社科院则将职称评审、职务聘任和岗位分级统筹考虑，职称评审只评资格，回归其评价功能，不再与工资待遇挂钩；职称评审结束后，按照空岗补缺原则，开展分级聘用工作。

建构实质性人才社会化、市场化评价新体系。建立新的人才社会化、市场化评价体系需要处理好三个衔接，即组织内部人才评价与组织外部人才评价的衔接、职称与职业资格的衔接、人才培养与人才社会评价的衔接。

职称与职业资格衔接方面，自1994年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以来，两种制度并存，在规范清理职业资格后，结合职称改革方向和社会需求，需构建新的人才评价体系，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人才培养与人才社会评价方面，国外的工程师资质认证制度可以提供参考，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将工程教育与工程师资质认证密切衔接，既解决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促进了工程师的职业化发展，也为工程师资质的国际互认奠定了基础。（孙彦玲、孙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博士、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017年4月14日，中国青年报。）

【信息摘编】

与 46 个国家和地区学历学位互认！“一带一路”教育在行动

4月19日下午，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教育部国际司司长许涛介绍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取得的先期成果和未来的行动规划等。

与 46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经审批的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共有 2539 个……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成果多多，下面一组数据带你看看——



◆ 设立“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研究智库报告课题

系列报告覆盖**66**个沿线国家  

一国一本，共计**66**本    

(二) 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得以深化

◆ 2016年选拔**226**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赴

34个国家    

选派**908**名涉及**37**门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出国培训进修

◆ 每年向沿线国家额外提供总数不少于

3000个奖学金新生名额。  

◆ 截至目前，经审批的各类

中外合作办学共有**2539**个  

本科以上层次项目和机构**1248**个

高职高专层次项目和机构**928**个



推动了一批示范性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包括**15**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57个合作办学项目



◆ 截至**2016**年我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了

4个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



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

大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

（三）共建丝路合作机制得以推进

◆ **2016**年通过包括中俄、中印尼

在内的**六大**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

共签署**86**项合作协议



取得**400**余项成果



共有**10**万多名中外来宾与会参加相关活动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取得了哪些成果？

1 教育互联互通合作得到强化

在加强政策沟通方面，先后与 46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其中，“一带一路”国家 24 个，包括中东欧 8 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东南亚 5 国（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亚 5 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独联体 3 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南亚 1 国（斯里兰卡）；东亚 1 国（蒙古）；北非 1 国（埃及）。

在助力教育合作渠道畅通方面，根据中央部署，教育部和中央外办等部门合作起草并由中办、国办转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扩大和深化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政策支持，得到了广泛欢迎和肯定。

在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方面，教育部国际司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支持该校通过引进国外师资、公派留学、与国外高校开展合作等多种方式，使该校开设的外国语言专业在 2018 年达到 94 种，实现外语专业设置全覆盖。

在推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方面，重点组织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全面加强对接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了解和理解，为推进民心相通提供智力支撑。一是设立专项课题，共发布了 141 项研究课题，其中 70 项涉及“一带一路”的 46 个沿线国家。二是形成系列智库报告，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报告课题，系列报告覆盖 66 个沿线国家，一国一本，共计 66 本。

在推动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方面，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协调世界银行编写了《关于国际教育趋势及经验的政策建议》，由我国牵头组织制定了《亚太经合组织教育战略》《中国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2 人才培养培训合作得以深化

在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方面，实施《留学行动计划》，2016年共选拔226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赴34个国家，选派908名涉及37门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出国培训进修。“留学中国”品牌逐步形成。注重来华留学高端人才培养，设立卓越奖学金项目，培养发展中国家青年精英和未来领导者；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每年向沿线国家额外提供总数不少于3000个奖学金新生名额。优化来华留学政策法规环境，构建完整的来华留学政策链条，新出台了《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规定》等文件、大幅提升政府奖学金学历生比例（已达90%）、加强来华留学质量建设、建立质量标准体制和质量保障机制，推动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建设不断升级。推动高校加强来华留学品牌课程、专业建设，评选出第二期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150门。

在实施“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划方面，一是中外合作办学水平稳步提升，已进入“提质增效、服务大局、增强能力”阶段。截至目前，经审批的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共有2539个。其中，本科以上层次项目和机构1248个，高职高专层次项目和机构928个。推动了一批示范性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包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浙江大学爱丁堡联合学院等15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57个合作办学项目。二是境外办学稳妥推进。截至2016年，我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了4个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4个机构分别是老挝苏州大学（2011年批复设立）、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2013年批复设立）、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2013年批复设立）、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2014年批复设立）。开设专业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医药、中医针灸、中国传统武术、体育教育学、工商管理、法律、教育学、金融与投融资管理、哲学、法律、学前及特殊教育、航海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新闻及传播学等。

3 共建丝路合作机制得以推进

在加强“丝绸之路”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方面，2016年，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各项活动举办水平达到了新高度，刘延东副总理用“非常顺利、非常成功、非常满意”给予了高度评价。2016年通过包括中俄、中印尼在内的六大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共签署86项合作协议，取得400余项成果，共有10万多名中外来

宾与会参加相关活动，为我国外交健康发展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与民意基础，教育国际合作在人文交流机制平台上得到实质性推进，如中国-东盟启动实施“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千名中小学教师交流计划”等。今年将新拓展中德和中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

在实施“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方面，开展了“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教育援外行动，在中非各选择 20 所高校开展一对一长期稳定合作，鼓励合作双方在各自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与交流，包括合作科研、教师培训、学术交流、师生互访、共同开发课程、联合培养研究生等。2016 年针对“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开发了网上申报系统，共有北京大学等 18 所高校申报了 25 个项目。

【聚焦“双一流”】

“双一流”大潮中的乱象与抉择

众所周知，近一两年间，“双一流”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又一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2017年春节前几天发布的《“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无疑将“双一流”建设助推到风起云涌之态。由于涉及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与分配，事关发展乃至生死存亡，无论愿意与否，从政府到大学都受到“双一流”建设的大潮席卷，并不由自主地陷入到科研指标和大学排名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为了科研指标和大学排名，各地政府纷纷表示要大手笔投入高等教育，目前已有20多个省份相继抛出自己的“双一流”计划，少则几十亿元、多则上百亿元地投资“双一流”建设。在已公布“双一流”建设计划的21个省中，明确表示到2020年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总共有10所左右，到2050年该数字更是增至21所左右，这还不包括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京沪两市。

为了科研指标和大学排名，国内有些大学不惜血本重金揽才，“挖人竞争”呈白热化。那些头顶各种光环的学者成为待价而沽的“凤凰”，随时可能另栖高枝。“挖人竞争”使得中西部和东北大学人才流失加剧，原本实力雄厚的大学受

到重创。

为了科研指标和大学排名，不少省市表示要对地方高校进行调整、撤并及重组，期待通过合并实现“强强联合”。然而，由于高校合并的成本非常高，貌合神离甚至冲突严重直至不欢而散也是合并高校常有的事情；即便合并的挑战能够成功，其间的阵痛、损伤和动荡也在所难免。

不可否认，科研指标和大学排名已成为各级政府和大学把控“双一流”建设的实际抓手。但客观地说，各地方政府和大学为“双一流”建设所做的上述种种努力，本身或许就会导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些乱象，让中国的大学迷失方向。

若单从近些年中国大学在世界各大学排名榜上的迅速崛起看，我们有理由对“双一流”建设信心满满。但正如学者阎凤桥所言，“世界一流大学，看起来离我们很近，其实离我们很远”。简单地说，比起科研指标和大学排名上的差距，中国大学在关注并及时满足学生成长所需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甚远。说到底，关注并及时而充分地给予每个学生成长的需要，才是大学作为学校的根本。

关注并及时满足每一个学生成长所需，需要大学真正把每一位学生的心理诉求和才干成长放在首位，成为大学的灵魂，而不是某些场合仪式性的表白或装饰性的口号。需要大学创新科研、力争一流，但绝不能够沦为科研指标和大学排名的“殖民地”，因为大学首要任务是培育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所有教学、科研和服务活动都应该围绕育人展开、为育人服务。

总之，关注并及时满足每一个学生成长所需，是大学的立校之本。离开了这一点，无论科研指标和大学排名的神话多么美妙，大学终究会走向不能回归的荒芜。关注并及时满足每一个学生成长所需，或许不能解决今天大学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问题，但作为一种崇高理想，它应该是大学在“双一流”大潮中始终明确并永不放弃的抉择。

“双一流”建设与东北、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人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而对于大学来讲，若要建设好“双一流”，拥有一支高水

平的人才队伍则是关键。自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为在“双一流”建设中抢占先机，各高校纷纷出台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工程），不惜重金到处“挖掘”人才（尤其是院士、长江学者等高端人才），从而引发各地域、各校间“抢人大战”，竞争态势愈演愈烈。2017年2月24日在教育部召开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挖走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人才本是一种资源，人才流动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在高层次人才资源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高层次人才流动出现了畸形发展，因此，如何破解区域间高层次人才流动失衡难题，凸显必要性和紧迫性。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十六位教育学博士（生）（排名不分先后）的观点。

——平和光/吉林省教育科学院

姜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双一流”建设，关键在于一流的人才。一些高校利用市场化手段招揽人才，短期内试图通过人才优势，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本身无可厚非。但从专业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呼唤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双一流”政策出台的目的，旨在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并通过它们的辐射和引领作用，带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高校倘若出现无序的人才竞争，只会使得马太效应更加凸显，这就违背了政策的初衷。笔者以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应有的生态，也惟有如此，才能促进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可持续发展。

包水梅（兰州大学副教授，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

“双一流”时代，人才争夺战是一场回避不了的残酷竞争，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高校必然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困境。虽然教育部明确指出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但事实上，高校合理招揽人才无可非议，教师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亦无可厚非，优秀的人才从来不缺机会。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高校要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唯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才是根本。既然不具备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就要努力创造学术环境优势，建立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的创新机制，从基本的住房福利、子女入学到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学术环境方面入手加以改善。教育部层面则需要对人才聘用合同契约进行规范化管

理，建立起相关人员自觉遵守契约的有序机制，一切按契约办事，从而优化人才流动环境。

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里瑟琦智库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

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国家主权先于各个行政区划存在，地方行政区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具有主权特征。建国以后的高等教育布局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方面的匹配性、适应性方面考虑相对较少。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已经成为国之重器，尤其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城市之间进行核心竞争力对比的关键性要素。高等教育的布局不应该维持过去以政治为主的考量框架，要充分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符合因素考虑进来。在原有框架下，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特大型城市，形成几个主要的高等教育重镇。这些高等教育重镇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速度存在差异，也有部分原有高等教育布局较为薄弱的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拥有了大量可支配资源用于发展本地的高等教育，这就导致高等教育的国家布局和高教育的市场布局之间出现了一种张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个大前提，中央始终对高等教育的地区公平负有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地方在发展跟自己本地区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应当有更多的考量，不应当不考虑地区现状和特点，盲目地追求同一化的一流。

（高校教育管理，2017年4月13日）

主 编： 张大林
执行主编： 王 迪
编 辑： 刘 瑶 张羽岚

呈：校党政领导

发：全校各单位

贵州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